

黄苇町◎著

苏共亡党 二十年祭

SUGONG WANGDANG ERSHINIANJI

● 心中没有人民，必被人民抛弃



江西高校出版社

苏共亡党 二十年祭

SUGONG WANGDANG ERSHINIANJI

黄苇町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苏共亡党二十年祭 / 黄苇町著. — 南昌: 江西高校出版社, 2013.4

ISBN 978-7-5493-1887-2

I. ①苏… II. ①黄… III. ①苏联共产党—党史—研究 IV. ①D351.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66876 号

苏共亡党二十年祭

黄苇町 著

责任编辑	邱少华 邱建国
封面设计	杨青
排版制作	邓娟娟
出版发行	江西高校出版社
社址	江西省南昌市洪都北大道 96 号
邮政编码	330046
总编室电话	(0791)88504319
编辑部电话	(0791)88523090
发行部电话	(0791)88517295
网 址	www.juacp.com
印 刷	南昌市红星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00mm × 1000mm 1/16
印 张	24
字 数	260 千
版 次	2013 年 4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93-1887-2
印 数	20000 册
定 价	42.00 元

赣版权登字-07-2013-182

有 侵权必究

FOTOE 和东方 IC 图库

自序

中国会不会成为“下一个”？

从以《苏共亡党二十年祭》为题在国家行政学院做首场报告到成书，已过去两年多了，准确讲，本书应该叫“二十二年祭”了。首先要向读者和约稿的江西高校出版社致歉。

22年来，人们对剧变原因的探究从未停止过，最庞大的研究群体在中国。这不奇怪。同为世界上两个最大的、执政时间最久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之一，研究苏共的失败，也是寻找我们党肌体上可能潜伏的“病灶”。因此也与其他历史问题的研究，表现出一个很大不同。即参与者中不仅有专家学者，还有各条战线的党员干部、各种职业的党内外人士。这正是“常怀忧党之心，恪尽兴党之责”的忧患意识的体现。

有种观点认为，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全盘否定斯大林，是苏联由盛到衰的转折点；戈尔巴乔夫背叛马克思主义，导致苏共垮台。他们说，西方反斯大林，攻击的其实是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随之起舞，很容易落入陷阱。

这种政治警觉十分可贵。但如果因为一些西方人士

别有用心，就把斯大林模式与科学社会主义划等号；因为戈尔巴乔夫提出“民主化”“公开性”，搞乱了人们思想，便认为“反其道而行之”就能长治久安，同样会误入歧途。

斯大林是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的名字，是与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巩固和发展，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联系在一起。但遗憾的是，他没有始终以马克思主义者的科学态度，来发展完善自己创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模式，而是将其凝固化、神圣化，视为各国共产党都要遵循的“普遍经验”。他最严重的错误，就是上个世纪30年代开始的“大清洗”，种下苏共亡党的祸根。最有力的证明，就是1996年俄罗斯总统选举时，苏联已经解体5年，物价上涨6000多倍，绝大多数俄罗斯人毕生的积蓄被一卷而空。面对叶利钦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人们照理应把票投给他的对立面、俄共候选人久加诺夫。但叶利钦的竞选班子，让电视台滚动播放“大清洗”的镜头和纪录片，以此告诉大家，谁投俄共的票，就是准备回到自己和家人不知何时会失踪的年代。选举结果表明，人们更害怕回到苏联的旧体制中去，因为几乎每个苏联家庭或其亲属，都有“大清洗”的受害者，几十年后仍积怨不消。如此来攻击俄共，最能激发群众情绪。

同样，把一个执政70多年、拥有近2000万党员的大党的崩溃，归罪于“两个叛徒”，也有些简单化。恩格斯在总结1848年革命失败教训时说：“当你问到反革命成功的原因时，你却到处听到一种现成的回答：因为这个先生或那个公民‘出卖了’人民。从具体情况来看，这种回

答也许正确，也许错误，但在任何情况下，它都不能说明任何东西，甚至不能说明，‘人民’怎么会让别人出卖自己。”显然，“这些原因不应该从一些领袖的偶然的动机、优点、缺点、错误或变节中寻找，而应该从每个经历了动荡的国家的总的社会状况和生活条件中寻找”，“如果一个政党的全部本钱只是知道某某公民不可靠这一件事，那么它的前途就太可悲了”。^①问题出在少数领导人身上，但深层原因，还是要从体制和机制、从这个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变化中去寻找。

当年的布尔什维克党，本质上是被人民群众的革命浪潮推上历史舞台的。1905年前后，沙俄爆发了争取面包与土地的农民革命。沙皇政府总理斯托雷平迷信警察统治，提出了“先安定，后改革”的口号，将行刑队和“战地法庭”派往各地，审判并立即处死参加“土地恐怖”的骨干，以至绞索在俄国被称为“斯托雷平的领带”。失地农民涌入城市打工，造就了一个一贫如洗、看不到希望的产业工人阶级。而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占农村男劳动力一半的1300多万农民和200多万城市居民被征召入伍，驱赶向帝国主义战争的绞肉机。恶劣的后勤条件导致全线溃败，大批“带枪的人”结伴返回内地。正是在这一大背景下，罗曼诺夫王朝于1917年2月垮台。政权更迭的直接原因竟如此微不足道：首都的几家商店，因进货不足出现面包脱销。在彻骨的寒风中排队很久却未买到面包的居民，一怒之下砸、烧了商店，引发大规模骚乱。派去镇压的首都卫戍部队哗变，工人和士兵逮捕了朝廷大臣、将军。仅仅7天，沙皇就被迫退位了。时任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6月第2版，第483页。

彼得格勒第一届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委员的苏汉诺夫说：“没有一个政党直接参加了革命的准备工作的，当时谁也没有把这一天当作革命的开始，因为这种骚动在人们面前已经出现过几十次了。”此时还流亡国外的列宁，两个多月后才赶回国内。托洛茨基、斯大林等人到达得更晚^①。

由于临时政府要求人民继续忍饥挨饿、付出生命和鲜血进行帝国主义战争，引起广大工农兵群众强烈不满。于是，经过暴力革命，政权再一次被转移到以“和平、土地、面包”为口号的布尔什维克党和工兵代表苏维埃手中。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与布尔什维克党领袖列宁的努力分不开，但十月革命能在几小时内便取得决定性胜利，与其说是列宁和彼得格勒革命军事委员会作战指挥部的杰出领导才能，不如说是强烈的、爆炸性的社会情绪强力推动的结果。因为在那个混战的夜晚，即使斯莫尔尼宫的作战指挥部中，也没有谁能准确说出攻入冬宫的有哪些部队。

在短短8个月时间里，一个横跨欧亚两大洲的世界大国，竟先后有两个貌似强大的政权，如此戏剧性地被人民群众的革命浪潮所掀翻。“国家兴亡取决于人心所向”在这里获得最深刻的诠释。布尔什维克党的执政资格，与其说是通过武装斗争夺取的，不如说是因为提出了正确口号和政策，赢得了俄罗斯人民的信任和支持获得的。十月革命作为社会主义开天辟地的事件，作为全世界共产党人的教科书，“始终和人民在一起”，是其中最需要永志不忘的一条。但遗憾的是，在苏共执政的70多年间，恰恰这一条被淡忘了，甚至丢弃了。

^①王中宇：《苏联解体二十年祭》，武汉《决策与信息》杂志2011年3月号。

客观地讲，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在实现全民就业和发展教育、科学、文化、社会福利事业等方面曾取得巨大成就，并被全世界劳动者所向往。1929—1933年的世界资本主义大危机期间，申请移居苏联的美国失业工人就在苏联使领馆前排起长队。但令人遗憾的是，在大危机过后，当西方资产阶级政府不断调整政策，包括为缓和阶级矛盾，将苏共建设社会主义的一些经验为己所用，使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获得更大发展空间时，苏共本身却日渐脱离群众。包括一些改革先驱者利国利民的重要探索，也被那些眼中只有自己和家人、却看不到人民疾苦和社会危机的强势利益集团所扼杀。

还有，苏共^①是以人民的名义取得政权的，并把实现“人民当家做主”作为自己的旗帜。苏共执政的合法性，就是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的。但在后来的执政实践中，却逐渐演变成替人民当家做主、以人民的名义为少数人获取利益的政党。特别是长期实行自上而下的干部委任制，党内外群众不仅无法按自己的意愿选举领导者，甚至不能监督和批评他。这种对民主的惧怕，归根结底还是苏共对自己缺乏信心、对群众缺乏信任，特别是既得利益者怕失去权力的心态在作怪。

于是，一个在血与火的战争中依靠人民支持获胜的党，变成和平年代被绝对权力腐蚀的党；一个用先进理论武装、团结和引领群众前进、不断改革创新

^①作者注：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派为前身的苏共曾多次改名。1912年，成立独立的布尔什维克党。1918年3月，党的“七大”将党名改为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简称俄共（布）。1925年12月，党的“十四大”改称全联盟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简称联共（布）。1952年10月，党的“十九大”改称苏联共产党，简称苏共。因此本书按照每个时期的实际称谓，先后使用了“布尔什维克党”“俄共（布）”“联共（布）”“苏共”等不同名称。但有时也以“苏共”来泛指，例如此处从总体上谈共产党执政合法性问题时使用“苏共”。

为落后于时代要求、思想僵化、鼠目寸光的党；一个与群众保持血肉联系、生死与共的党，变成与群众疏远、隔离甚至对立的党；一个为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而牺牲奋斗、奋不顾身的党，变成被既得利益集团所把持、以权谋私的党。而“心中没有人民，必被人民抛弃”。当这个执政党早年积累的人气和人脉、信心和信任，被逐渐耗尽，甚至透支，当人们对这个党的期待，从满怀希望变为一次次失望，最后变为绝望，它也就走到了自己生命的尽头。而建国时在各方面远远落后于苏联的中国，却在我们党领导下，通过改革开放，创造了人类社会和中华民族历史上新的辉煌。这种历史分野是如何发生的？与这两个民族的文化传统、与这两个党漫长的发展轨迹有何联系？本书就是循着这样一条历史主线展开的。

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的改革，就是要改掉过去仿照苏联建立的传统社会主义制度模式的弊病；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不再把苏联特色社会主义奉为经典，而要探索适合中国国情和时代特点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苏共的失败，不仅是对中共成功的反证，也是对社会主义道路上可能还隐藏着发展陷阱和凶险的警示。因此，对这两种不同发展结局的比较和思考，也是共产党人的重要历史财富。

2011年12月26日的《人民日报》，曾刊登了一篇署名国纪平的评论——《主动把握历史的未来》。评论谈到，1991年苏联解体时，有些西方政客把持不住心头的兴奋，提出了一个醒目的命题：中国会不会成为“下一个”？当时他们就宣称：“发源于20世纪的共产主义制度，必将

终结于20世纪。”也就是说，即使按最“乐观”的估计，他们认为社会主义中国最长也“撑不过”10年。

如今，20多年过去了。不仅到2011年底我们党已拥有8260万党员，超过欧洲第一大国德国8180万的人口总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也超越德、日等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国际金融危机、欧洲债务危机接连上演，西方社会一片焦头烂额之际，是中国与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共同承担起保障全球经济稳定增长的“火车头”和“防波堤”作用，避免了经济危机、金融危机、债务危机的全球化恶性扩散。即使苏东剧变时最唱衰中国的西方预言家，也不得不在无可辩驳的事实面前，承认当初可能“看走了眼”。中国会不会成为“下一个”的咒语，已在很大程度上沦为人们的笑谈。

但作为一个成熟的执政党，成就再骄人，也要保持冷静清醒的头脑。不仅因为导致苏东剧变的隐患在中国也不同程度地存在，我们党还面临一些当年苏共也未遇到过的风险和挑战。

苏东剧变前，社会主义已在占世界1/3人口的国家取得胜利，二战后新独立的国家中也出现“社会主义热”，民族解放运动此起彼伏，西方国家在政治上总体处于守势。如今，国际共运跌入低谷，西方则借助全球化及互联网优势，从经济和金融领域打压，到思想和意识形态上渗透，对他们眼中“最大的也是最后的共产党国家”发起全面围攻。还有，苏联曾是与美国平起平坐，还略占优势的军事超级大国。核弹头超过美国50%，陆海空军已从防御体系变为世界范围内的进攻体系，在很多地

区和领域与美国争霸。而中国原来的科技和工业基础比苏联薄弱得多，且长期坚持和平发展方针，相比二战后几乎一天都没有停止过局部战争的美国，军事实力上存在明显差距。随着中国的崛起，各种遏制活动也愈演愈烈。从支持“藏独”“疆独”势力制造分裂祖国的暴力事件，到怂恿周边国家对我国一半以上海域提出主权要求。有人说，当年西方靠军备竞赛拖垮了苏联，今天还想用同样方法拖垮中国。这注定今后若干年内，我国周边都不会平静。因此，胡锦涛在2012年“7·23”讲话中指出：“来自外部的风险前所未有”。如何既抓住发展机遇、坚持建成全面小康社会目标不动摇，又努力强国强军、应对各种外来威胁，也是对我们党执政能力的一大考验。

还有，苏联地大物博，是占世界陆地面积1/5的幅员最辽阔的国家，也是极少的能在境内满足发展所需全部资源的国家之一。中国则是世界大国中人口最多、人均资源相对最贫乏的国家。按照理论计算，中国的自然资源只能承载9.5亿人口，可现在已近13.5亿之众。高度“超载”的中国，如果继续沿用苏联的粗放式发展道路，发展越快，对外部资源依赖越大，对内部环境透支越严重。不久前曾席卷十几个省市的重度空气污染，就是一个明显的警号。能否在保持必要的增长速度的同时实现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已直接关系到人民的健康和民族的未来。

要应对这些风险和挑战，关键在于我们有没有一个团结统一、有强大战斗力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在于我

们党能否把13亿中国人集聚在自己的周围，团结奋斗、共克时艰，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而要保持我们党密切联系群众的政治优势，既要认真汲取苏共历史教训，又要及时消除现实生活中任何可能危及党群关系的隐患。

改革开放以来的1/3世纪，特别是党的十六大以来的10年，是中国发展最快、人民群众得实惠最多的10年。这个基本事实，决定了我们的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队伍，总体上做到了“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是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戴和支持的。这是我国能取得全世界瞩目的巨大成就的基本条件。但也必须看到，发展以后的问题，并不比发展以前少。尤其是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的“发展不平衡，体制机制障碍多，收入分配差距大，一些党组织软弱涣散，消极腐败现象易发多发，反腐败形势依然严峻”这6个方面的问题，是最遭致群众不满、也最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因素。特别是随着皆大欢喜的普惠式改革越来越少，有得有失的利益整合性改革越来越不可避免，阻力必然越来越大。如果说，改革开放初期来自党内的阻力，很多还属于“左”和“右”，是围绕改革是与非的观念之争。现阶段改革面临的阻力，更多的已不是是非之争，而是利益之争。这种利益的分化和冲突，也反映到党的领导层中，使改革的复杂性大大增加。如果说，改革开放初期，我们需要冲破的主要是思想禁区，那么今天更需要冲过的是利益雷区。冲过利益雷区的困难和危险程度，远超过思想禁区。为什么改革深入到今天，有些地方和部门的改革，还一

直在谨慎地绕开敏感或要害之处？为什么绝大多数人都感到迫在眉睫的有些改革，却“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为什么打着“改革”名义“甩包袱”甚至“劫贫济富”现象仍时有所见？为什么说改革已进入机遇期、关键期和攻坚期？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改革也在日益逼近一些改革者自身的利益。改革的推进，越来越取决于我们党的意志、勇气和毅力，取决于能否始终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宗旨。

还有，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是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冲击，保就业、稳增长、维持发展后劲的重要途径。但在现行财政体制和干部考核机制尚未根本改革的情况下，靠卖地弥补地方财政缺口，靠举债上公共工程创造GDP，也是一些地方政府无奈的选择。但有些地方先以低地价拿走农民的土地，再以高房价挖光居民的积蓄，这个差价又会在房地产商和有关部门之间层层分配。而大规模举债建设带来的流动性过剩、货币贬值，使工薪阶层的储蓄和退休老人的“保命钱”进一步缩水。这种难以遏制的建设冲动，不仅导致很多崭新的低龄建筑被拆除，很多社会财富和文化遗产被毁灭，也成为对社会分配的“重新洗牌”。尤其在公共工程大干快上，却对公权力监督不到位的情况下，很容易滋生腐败。有些城市的大拆大建，表面上为政绩，其实也隐含着制造腐败机会的强烈动机。一方面许多建设资金被层层剥离、流入某些人的私囊；另一方面为压低造价而偷工减料和无资质施工，又导致桥断、路毁、楼塌、地陷、隧道爆炸等飞来横祸，不知会在何时何处降临。曾掌握了巨额铁

路建设投资的原铁道部长刘志军和作为他的“提款机”“洗钱机”的女老板丁书苗，涉案金额之巨，更冲击着人们的心理承受能力。这些转化为个人非法收入的巨额建设资金，是隐蔽和公开的亿万富翁迅速增多的重要原因。

因此，在我国的经济生活中，既有比科技创新、比经营管理水平、比劳动者素质的公开的合法的竞争；也有比权力背景、比社会关系、比贿赂手笔的暗中的非法的竞争。而公共权力一旦变成资本，其最大的神奇处，就是能在极短时间内完成一个海外家族企业几代人才能完成的积累；商场上难免有赔有赚、有哭有笑，但他们永远只赚不赔、大小通吃。这个资本积累还会随着掌权者的升迁而加速膨胀。这也决定了能攀上中国财富金字塔尖的，除了熟谙商场与国情的“经营奇才”外，还有另外两种人：一种是依靠权力和靠近权力致富的“隐形富豪”，即吴敬琏所说的“权贵资本主义”；另一种是依靠收买权力，即对权贵者进行利益输送而暴发起来的“草根富豪”。有些“草根富豪”本来是受“潜规则”敲诈、绑架的受害者，后来也历练成害人者，用钱铺路，用钱买权，靠钱“闯关”，导致“一个富豪出了事，上百个干部倒下去”的乱象一再出现。大批市场主体在权力竞争而不是市场竞争中被淘汰，使财富集中的速度大大加快。极少数人穷奢极欲的生活方式，更使这种收入差距被最大限度地彰显出来，刺激着人们敏感的神经。“饱则思飏”，把非法聚敛的巨额财产转移到海外避风港，也成为腐败分子和不法富人迫不及待地在做的事。于是便出现了这样一种具有讽刺意味的情景：一方面各地党

和政府耗费大量人力、物力招商引资，以各种优惠条件来争取每笔几亿、十几亿美元的外来投资，并提供很多土地建厂，在国际分工体系产业链的低端挣点辛苦钱，包括为全世界生产手机，每部只挣几十元；另一方面每年有数以千亿元计的“黑钱”、“灰钱”，通过各种途径外逃，导致国民经济大量失血。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字，衡量社会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在中国已远超过0.4的国际公认的警戒线，接近0.5。有报告显示，中国41.4%的财富掌握在1%的家庭手中，已经是世界上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

20世纪80年代的一项调查表明，在世界各国中，苏联、东欧、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公众，对收入差距过大和“以权谋私”的腐败活动的承受能力最低。这与共产党长期进行的人民群众当家做主、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社会主义宣传教育已深入人心、成为全社会的道德制高点分不开。因此，对人民利益和社会公正的忽视，是导致苏共垮台的关键原因之一。即使在资本主义国家，极少数人过多地占有社会财富，损害绝大多数群众利益，也会带来巨大的政治风险。两年前在美国发生的反金融资本的“占领华尔街”活动，示威者喊出的最令某些人心悸的口号，就是“他们是1%，我们是99%”！

其实，当年的我们党，就是靠发动“99%”的群众为自身利益而奋斗起家的。很多有产阶级出身的老一代共产党人的牺牲精神尤为感人。我们党最早的5位农民运动领袖，除广州农讲所第二任所长毛泽东出身富农家庭外，其他都是大地主家庭出身。这不奇怪，如果当时家

里没有几个钱，他们很难外出读书，也没有机会接触马克思主义。有历史记载的中共最早的农运领袖叫沈玄庐，是建党时53名党员之一。他父亲家财万贯，在浙江萧山一带拥有大量土地和房产。但沈玄庐回到家乡后，公开站到土地庙前讲演，号召农民起来斗争，并多次表示自己不向农民收租，还要把家里从农民身上得来的钱，用回到农民身上。家里人以为他疯了，农民也以为他疯了。广州农讲所第一任所长彭湃家的佃户超过1500人，他留学回来已当到县教育局长，却毫不犹豫地抛弃了荣华富贵的前途，发动农民起来革命，甚至亲自带人分自家的土地，把父亲气个半死，却被农民呼为“彭菩萨”“农民王”。广西的韦拔群，家里也是当地首富，村村都有他家的粮仓，牛群之多，到了有牛因拥挤踩踏致死、许久都没被发现的地步。但他也创办了农讲所，还变卖家产为农民自卫军购买武器，被壮族同胞亲切地称为“拔哥”。湖南的夏明翰则出身豪绅家庭，世代为官，后来却当了全国农民协会秘书长。那首大气磅礴的“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的诗句，便是他就义前的绝笔。这5位当时都很年轻的共产党人，是我们党联系农民群众最早的纽带。除了沈玄庐后来加入“西山会议派”，1928年被蒋介石派人暗杀，结束了毁誉参半的一生外，其他4人都成为坚定的革命家。当时的中国农村，文盲要占90%以上，且绝大多数祖祖辈辈生活在闭塞的乡村，除逃荒要饭外，很少有人知道外面的世界什么样。无论是对他们讲马克思主义，还是讲劳工权利，他们都很难听懂，更别说理解和接受了。而且，中国农

民整日在土里讨生活，非常务实。他们不仅要听你怎么说，更要看你怎么做，从中琢磨你这个人值不值得他信任。因此，真正吸引住农民的是这些共产党人极其“另类”的表现：他们家境优裕却无纨绔子弟作风，富家子弟却为穷人谋解放，甚至不惜散尽家财、变卖祖产，直至为贫苦农民的翻身解放献出年轻的生命。是什么使他们变成如此与众不同的人？人们才开始认真地听他们讲的道理，开始琢磨道理在哪里，琢磨他们的“主义”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力量？如果说，在中国城市，是先有马克思主义，而后有共产党人；那么在中国乡村，更大的程度上是先有共产党人，而后有马克思主义。亿万没有文化甚至不识字的群众，正是从这些共产党人身上，从他们的所作所为中，第一次认识我们党的，认识到共产党人是为他们的利益奋斗的，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是“穷人的真理”。这也是大革命失败后，尽管到处都是一片白色恐怖，但彭湃、韦拔群振臂一呼，就有成千上万农民响应的根本原因；是广州暴动失败后，他们的家乡广东海陆丰和广西左右江能够成为共产党人的栖身地和新的出发地的重要原因。

列宁有一句名言：“共产主义者的心，至少有一半生活在未来。”他们的精神世界之丰富，远超过现实的物质世界。而他们在物质世界里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这个精神世界的实现。领悟这一点就可以明白，为什么他们看到人民的苦难会止不住感情外露，面对高度物质化的世界的诱惑时，却能够心如止水；而在奔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目标时，又会屡犯急性病错误。因为，这就